

杨义著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杨义学术讲演集

0 250 500 千米



仰光



河内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马尼拉

杨义著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杨义学术讲演集

0 250 500 千米



中沙群岛

多多
马尼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杨义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5

ISBN 7-5004-3876-1

I . 重… II . 杨… III . 文学史 - 中国 - 文集 IV . 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4849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装 订 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125 插 页 2

字 数 44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都说演讲是一门艺术，这我也相信，却至今没有投师学习过。从小在海边农村长大，虽然打闹追逐，花样百出，但到了大城市后，当众讲话也要脸红。实在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角色，只好躲进书堆，用笔墨遮短。我是很崇拜那些讲课讲得让我们瞪大眼睛的中学老师的，赞叹他们的嘴是“那把铲儿”，似乎一铲就能入地三尺，掘出金银珠宝，一铲就能把稻谷扬上九天，变作天花乱坠。

后来我由普通的研究员出来当了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虽然没有多少抢坐主席台的瘾头，每年必须出席的会议却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个月开的会，比以往当研究员时一两年还多，这就使我简直换了一种人生方式。说是“四十不学艺”，我这时已经年过半百了，几乎是逢会都要你发言，而且还说是“主题发言”，使你不敢偷懒。因此也就开始留意讲演之术，免得使人家喜气洋洋的会议，一开头就因你的“主题发言”变成闷罐子。人生就怕历练，历练多了，再笨的笨伯也不至于练不出一两招来。“Can-do spirit”（肯做的精神）是个好东西，它逐渐地把我救出困境。

记得当所长不久，我便远渡重洋，到一家大学签订交流合作协议。仪式开始后，对方的州政府官员和校长发言，讲得典雅庄重，冠冕堂皇。刚好那天是四月二日，轮到我用英语即席发言的时候，我就说：“昨天我们刚刚度过愚人节，今天我们双方在一起，要过一个聪明人的节日。我们将签署一项合作备忘录，使双

方能够优势互补，共享丰富的学术文化资源。外面阳光灿烂，我们对即将开始的合作计划充满信心。”也许是因为阳光灿烂（brilliant）和充满信心（Confident）凑巧押上英文的韵吧，大家饶有兴趣地听完了我以下对双方合作的互利可能性的分析。会后还有汉学家说，我讲的英文可能比她讲的中文还要好。这实在是不虞之誉。

不过，到底是学者出身的人，学术会议的发言，不愿多讲套话。也许是杞人之忧，我担心套话多了，会把一个具有很高学术档次、又具有开拓、创新、建设精神的研究所的形象，套成了一个空壳。这就迫使我在会议讲话之前总要看一些材料，结合自己原先的学术积累，作一些学理性的思考。在现代文学的会议上，要讲点现代文学的行话；在古典文学的会议上，要讲点古典文学的行话；在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的会议上，也都想讲些与学科相关的话。能讲得到位，能给人一点启发，甚至由此引出一些新的学术思路，那就更好了。而且作为主题发言，要把握住会议的基本宗旨，不能过于琐琐屑屑、陈陈相因或奇僻怪异，要求最好能够提供一些大视野、新视野。多元的大视野、新视野的交叉叠加，而又追求其内在学理的一致性，这就使我感觉到，如此东一笔，西一笔地画出来的文学地图，与以往的文学史著的地图有了许多根本的差异。这种学理追求和角色规定，使我这个所长经历的苦处实在不忍对人言。

不少发言的印象都变得零碎淡远了。多少还留下一点蛛丝马迹的，是在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会议上的发言。那是海内外行家欢聚一堂的场合，我这个行外人士也被邀来凑趣。凑趣自然也得讲点趣话了，于是轮到我发言时就说：“祝贺两所比较文学的学者强强联合，成立这个非常有实力的研究中心。‘比较’一词在中国古代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官府限定差役在十天半月内要完成一个差事，到期检查，如果过期完不成差事，就得打屁股，这就是‘比较’。我们

比较文学的‘比较’当然不是从这里来的，它是从英文‘Comparative’来的。但是我们的文字学中也有与此相似相通的说法，《说文解字》解释‘比’字说：‘二人为从，反从为比。’这就启发我们，比较文学不是一个亦步亦趋地跟从另一个，鹦鹉学舌；而是要‘比肩而立’，用‘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进行平等的深刻的文学或文化对话。”我虽然没有从事过专门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我平日的研究常常运用中西文学的比较方法。我引用古典诗词和文史杂著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意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 *image*，而应该创造一个新词 *idea-image*；中国的“感悟”不能简单地等同西方的 *Comprehension*，而应该创造一个新词 *Pre-comprehension*。当然，在特殊的语境中，用比较微妙的，与宗教心理学有联系的 *illumination*（明，照明，阐明）或 *epiphany*（显灵，顿悟）一类词语去对译“悟”，也未尝不可，但是有限度地创造一些别有蕴涵的术语也许能吸引人们更多的思考。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学术话语，在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我举例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演《中国神话的解释学》时，曾提供一份英文提纲请那里的秘书打字，秘书说：“杨教授，这个女神的译名有点不符合英国人的习惯。”我回答说：“我是有意偏离英语的习惯，让你们停下来想一想，不然我们这个女神就变成金发女郎了。”

据担任翻译的同事告诉我，海外学者反映，我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这个发言是最有趣、最有实质内容的一篇。但是它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在此老话重温，是为了备忘。我的会议即席发言，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世间随风飘逝的事情多着呢，因而也就并不怎么觉得可惜。

本书收集的三十余篇会议发言，多是写在本子上的涂鸦之作。我在赴会之前翻看材料，对自己有所感触的，随手摘录在本子每页的 A 面，B 面则预留着空白。因为会议的类型很杂，文思难得顺畅，会上发言也就容易颠三倒四。预留空白是为了补救笨

拙，会前偶有感想，好在上面勾勾画画。于是整个本子到处是黑笔迹间插着红笔迹，简直涂成个大花脸。也难为了我的学术助手和打字员，她们竟能够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几条线索，重现了我当时讲话的内容。由于会后总有几个报刊约稿，不能不难为她们。至于讲演时的即席发挥，随时掺点水分（据某名校的经验，“掺水分”是讲课吸引学生的窍门），随时来点幽默，以及当时的会场气氛，那是很难复原的。讲演总要照顾场面，总要有现场感，失去现场感的讲演有可能变成苍白的自言自语，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这些发言中，《唐宋名篇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文化工程是人心工程》、《“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关于〈格萨尔〉精选本的文化启示录》、《价值重建与文学批评》诸篇，外间反响较多，这大概与我对故有的文学史地图做了较大变动有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由于本人到底还算是个学者，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开会，或是出国访学，都有些高校或文化机构请我开设学术讲座。听讲座的人员主要是高校师生，有时是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在职的或离退休的企业家。对研究生和对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讲演，不仅讲题有变化，即使相似的题目，讲的角度和深浅程度也有所不同。对研究生多讲点学理和学术方法，对普通听众多分析一些众所熟知的作品和故事。如果有好事者，将不同场合的这类讲演分别记录下来，大概也会成为不同的版本吧。我记得有的学者研究古代戏曲版本，把早出的版本奉为定本，对晚出的存在异文的版本，哪怕这种异文比早期版本更出色，也极力贬抑。看到这种现象，我有时觉得心里无数。因为戏曲是对观众演出的，一个戏班今天在桃花村演出，明天在枣子镇演出，观众不同，临场发挥有异，难免要出现一些不同版本。戏曲版本的流动性与经史典籍版本的稳定性是有所区别的，研究者似应根据实际情形调整研究的尺度。

在一系列学术讲座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给企业家们讲《中国

古典小说漫谈》。我曾在工厂工作近十年，这次又是老朋友、老同事以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的名义邀我去讲演，旨在提高企业家们的人文情怀和人文趣味，也就觉得义不容辞。但是面对社会阅历极为丰富的这几百位听众，必须调整讲演的视角。我主要从古代城市制度、民间伦理、社会习俗和叙事智慧的角度，剖析古代最杰出的几部长篇小说的文化精神实质。原定讲两个半小时，到时有不少听众一再要求“讲下去，讲下去”，直讲到超过三个小时才结束。我曾经在同一个讲演厅中，讲过《明代的“四大奇书”》，有人把两场讲演都听了，觉得后来给企业家讲的这一场“更放得开，更为精彩”。不过，它也没有被记录下来。我往往感到，我的学术讲座讲过两三次之后，才能渐入“佳境”，才更获好评，这大概证明我并非天生的讲演家的缘故吧。

《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是我讲得比较多的论题，而每次讲的题目、材料和角度都有若干变化。印象较深的是在江南某名校，大讲堂的过道、窗户上都挤满了人，我讲了三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人离开。另一次是在西南某高校，适值周末停电，但大讲堂中已聚满了几百学生，我说“我的嗓门大”，就在黑暗中讲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讲堂里通了电，安好了扩音器，又继续讲完。这个题目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也都讲过，听到过许多赞扬的话。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完后，他们用AA制请我在一家韩国餐馆吃饭，其中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史教授把我讲演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用英文复述给他的韩国太太听，逗得大伙儿哄堂大笑。那天所用的啤酒名称是“CASS”，和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英文缩写相同，于是大家就举杯祝贺“CASS”，祝贺讲演成功。

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我也讲过中国叙事学。在哈佛的那一次，竟然在匆忙中忘记带讲课提纲。于是硬着头皮，按规定讲了一个半小时，但是那里的汉学家、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听出了味道，要求我继续讲，于是又多讲了一个钟头。我在国内的

讲演，并不比在哈佛、耶鲁讲得差，但它们毕竟是世界名牌大学，它们的一点好评足以引起国内的诸多反响。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是我在哈佛、耶鲁的学术讲演如何“好”，如何“经典”之类，我也不想复述了。对于这个题目，我已写有一本三十万余字的《中国叙事学》，台湾南华管理学院出版社的本子是大陆人民出版社同书的“文存”本的修订本，我对它更为满意一些。据几位海外教授传来的消息，此书在中国台湾的一批文学博士以及韩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中颇受青睐，觉得中国特色的现代叙事理论到底有一点自己的模样了。如此用过一番功夫的著作，并非一次讲演就能囊括全部内容的。我在各地的讲演，都不断地调整了角度、思路和具体例证。我所以对哈佛、耶鲁讲座的反应比较重视，是觉得他们真正见过世面，真正识货。一个并不太聪明，但还算比较踏实的学者，穷二十年之工清理中国古今叙事文献，因而得到多少具有东方智慧含量的一孔之见，与那些通晓西方叙事理论的学人进行一些实质性的对话，使他们觉得这里还有一些可取的文化态度和学术思路。对此我虽能感到一点安慰，但并无更多的话可说。倒是从哈佛来北京的一些华裔学者，或从耶鲁来北京的个别著名教授，一再传来我的讲演获好评的信息，又有我所尊敬的长辈名家为此向我索书，几家出版社打电话来要给我出讲演集，这才使我感到惶恐不安了。

如果有人问我对自己的学术讲演有何评价，而又不想听我敷衍的话，我会告诉他，我讲的《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也许比《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更有味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南方和北方的一些重要学府或科研机构讲演的时候听到过许多溢美之词，也不是因为有重要的学者说：“依照你这种学术思路，如果弟子众多，很可能形成重要的学派。”我是希望中国学术界能够出现许多有特色的学派的，但我对目前学术界徒有热闹、不计实质的某种“制造学派”的做法，隐隐然感到一点悲哀。我觉得，学术泡沫还是少一点为好，但是如果有人说，西方

的维纳斯据说也是从海洋的泡沫里诞生的，那我也无话可说。我之所以对自己的诗学讲演感觉尚可，是觉得它讲了一些别人没有讲过的话，如果有人从中受到一点启迪，感到学问竟然还可以这样做（比如附录的华裔澳籍诗人庄伟杰文中所言），那是他的悟性极佳而产生联想所致，对于我本人已是始料不及的非分之想了。我本人觉得，只要从某个侧面证明，我的学术探索能力尚未衰退就是天大的幸事了。至于有的学人提出与我商榷，只要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学术建设性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是应该欢迎的。因为我的学术方法与部分同行确实存在差异，在原地上向前走出一步，就应该允许别人议论这一步是踏空了，还是具有实质的意义。通过诚实的、平等的讨论，说不定对古典文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多少有点好处。在《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的讲演整理稿后面，附上同题的答记者问和其他几篇反应文字，是想让读者体验一下我面对国内高校师生，与面对记者、面对外国学者的发言方式的差异，尽管所讲并无多少“出来”之处，但也可以捉摸一下面对不同对象的文化对话，有调整适应度的必要性。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本书的题目说几句话。明请八股文的固定程式，在首二句就破题，这里的破题方式已是“倒八股”或“反八股”了。为什么起一个“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书题呢？这并非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在汇编近十年间断断续续发表的这些学术讲演、学术答问之后，说实在话，我曾经为其长短不一，题旨参差的情形感到懊丧。懊丧之余，憬然省悟：这些左说右说的话都出自一人之口，折射着一个学人在艰难的不息追求中的某种内在学理逻辑，某种潜在的精神聚焦，这就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固有写作模式来一番开拓性或革命性的反思，思量的结果，就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学理性命题。以往的一般文学史写作，受近代北京学科体制的局限，往往古今分家，专注于汉语书面文献，时或读到功力深厚之作，为之心折，获益良多。但

心折之余，难免有些疑问：中国文学的深层智慧和意义就是这样吗？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完整版图就是这样吗？因为当我日益深入地接触大量的古今文献，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文献之后，就真切地感受到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解释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它的生存形态和发展动力的一个关键。

说到地图，它往往力图反映广袤的幅员和山川纵横起伏的地貌地脉，甚至其间丰富多彩的地质生态，物产矿产。我们画中国地图，甚至连汪洋大海中遥远微末的曾母暗沙都要标出，难道画文学地图就可以丢三拉四，不忌残缺不全吗？中国文学既有汉语文学，也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既有古典文学，也有现代文学；在现代，既有大陆文学，也有台、港、澳文学。此外或雅或俗，或书面或民间口传，或经典或前卫，地域既异，形态亦殊。当然，如此多姿多彩的文学形态，不是一加一地堆积着，而是活泼泼地作为精神文化的生命共同体在发展着。它们在“文化时间”中发生因革和变异，在“文化区间”中出现冲突和渗润，在“文化层间”中经历升降和转换。这“三间性”体现为复杂的结构、功能和动力系统。曾有人解释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思想或儒佛道交融互补的“超稳定结构”所致。其实这只看到文化的汪洋大海中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汉族聚居地的黄河长江文明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文明，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互动结构，各居中华文明多元共构中平等的一元。中心部分比其率先创造和发展的优势，具有强烈的辐射力和凝聚力，边缘部分则存在着不拘一格的活力。当中的部分模式化或僵化之时，边缘的活力就对之发起挑战，或对之输入新鲜智慧，在不打不成交中推动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重新整合，使中华文明长期处在居安思危，发愤图强，不敢懈怠，惟思进取的文化精神紧张感之中。文化精神紧张感，往往能够激发出一种不得不然的创造力，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也就是说：中心轴射凝聚力 + 边缘活力 = 文化生命力互动互补的重组。没有中心辐射力、凝聚力，生命力就

会耗散；没有边缘活力，生命力就会凝结、衰变。同时，中心和边缘在一些具体的文化问题上是相对的、变动的。比如佛教内传，以及大型民间史诗的远播，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居于向外辐射的中心。《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以“地势”比拟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构成，以“天行”比拟这些构成的动力系统，那么天地交泰，创造了千古文明的辉煌。这就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互为表里的双重意义，它表明，中华文明是东亚土地上五十六个民族（还有若干已融合或迁徙的古民族）共同创造的。

以讲演的方式涉及和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说明它还处在起步或探索的阶段，还需要付出更艰巨的诚实而执著的努力。治学的诚实、执著以及有点来之不易的实质性进展，这才是学者的本色所在。至于讲演，那只是学术的一种表现形态，尽管在现代社会中是愈来愈显示出重要性的形态，但也只是表现形态中的一种。无论如何，现象可以反映本质，却不能代替本质。

杨义

二〇〇二年九月三十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辑

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	(1)
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	(24)
附：关于诗学争论的四篇文章	(56)
文化工程是人心工程	(83)
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	(87)
“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	(98)
《续修四库全书》的精神启示	(110)

第二辑

唐宋名篇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	(113)
李杜诗学的当代价值	(117)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	(123)
诗魂的祭奠	(127)
中国民间文化精神的史诗	(131)
新诠释学视角下的明代四大奇书	(138)
《儒林外史》的时空漂移策略	(160)
文学与图	(165)

第三辑

- 开拓成长的二十年 (202)
关于《格萨尔》精选本的文化启示录 (209)
深入发掘《格萨尔》丰富的文化内涵 (215)
《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 (220)

第四辑

- 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世纪回顾和总结 (224)
关于现代文学的学术生长点 (232)
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 (239)
对现代文学做现象学的研究 (244)
鲁迅研究与新世纪人文学术方略 (251)
闻一多与清华 (256)
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260)
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263)
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 (266)
从文学插图谈到京派、海派 (275)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294)

第五辑

- 文学研究走进二十一世纪 (324)
价值重建与文学批评 (356)
文学香港在中国 (363)
两岸文化与同胞亲情 (381)
以大魄力、大智慧、大手笔开拓人文奥运新境界 (389)
中韩文化交流中的“韩流” (395)
《文存》存的是我的心血和生命 (404)

第六辑

探索古典小说研究的新思路	(411)
“我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414)
东方风来满眼春	(417)
寻找与西方学术界对话的方式	(419)
中国学者有话要说	(423)
从传统文化中寻觅民族精神的归宿	(426)
杨义：解读中国文化密码	(430)
中国文化的世纪反省	(437)
给中国文化或文学发张身份证件	(450)
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	(456)
杨义谈对“建设、创新、引导”六字方针的理解：	
文艺理论批评内在的精神逻辑	(471)
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	(478)
杨义访谈录	(481)
聆听诗性智慧的中国声音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	
校读记	(520)

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

一、关键在于回到中国文化原点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大体采用三种不同的思路：一种侧重传统的治学方法，以扎实的考据、版本和文献的功夫，引导出朴实而真切的见解；另一种是侧重于引进西方现代理论的观念和方法，用“另一只眼睛”重新打量中国文学的经验，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学术的历史进程中，这两种思路都逐渐地暴露出它们各自的若干弱点和局限。前者之弊，是可能流于“板”，难以形成完整形态的现代学理体系。后者之弊，是可能流于“泛”，某些石破天惊的见解也许会给人隔靴搔痒之感。世界上很难找出一种十全十美的学术思路，这是历代学人焦虑不已的事情。我曾经读过数千种的中国叙事文献，但苦于难以理出头绪，形成自己的创新的学理体系。我也曾经到英国牛津大学当客座研究员，阅读过不少西方叙事学的著作，在受其启发而扩大的自己的学术视野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感觉到西方理论难以充分地覆盖中国文学经验和文化智慧的精华。甚至产生这么一种想法：西方文学理论的所谓“世界性”，乃是一种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世界

*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处的讲演稿。

性，精通中国古今文献、经验和智慧的学人，完全有资格、有实力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我追求第三种学术思路：立足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融通东西方的理论视野，探索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这种学术思路在二十世纪颇有一些前辈学者试验过，为了提高它的有效性，我用四句话作为基本的学术方法论：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创造新的学理。概括起来，就是“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所谓“八字真言”。

那么，在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体系的时候，怎样才能在中国文化原点上建立自己的学术逻辑起点呢？这就需对“叙事”一词，作语源学和语义学的追踪。

“叙事”这个词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叙”是用顺序的“序”，主要是讲奏乐或者丧葬仪式上的顺序，使乐器的摆放和仪式的进行，都整然有序。它和空间的左右、时间的前后都有关系，只不过它最早使用，不是在语言表述的领域，而是在中国非常看重的礼仪领域。“序事”这个“序”字根据《说文解字》的分析：“序”是“广”字头，广在古代是依着山崖所盖的房子。而且我们古代把堂屋上面的墙叫“序”，堂屋下面的墙叫“壁”，它是一个空间的分隔的墙。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讲述故事，就是要把空间的分隔转为时间的分隔，按顺序来排列了。在古代，叙事的“叙”和顺序的“序”、头绪的“绪”都是相通的，就是说我们的叙事学又是头绪学，又是顺序学，又是把空间的分隔换成时间的分隔，重新进行安排的这样一种学问。这是我们从语义学和语源学的角度，考察出“叙事”这个词语的意义可能性。“叙事”这个词一直到了六朝的《文心雕龙》才出现，《文心雕龙》里有两次提到过叙事，但它还不是作为一个关键词来讨论的，而是用在碑文或哀词的文体风格的介绍上。叙事是个动宾结构。